

温州市方言志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本市概况

地理、人口、语言、经济、文化、地位

(一) 温州方言的概况

(二)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及其特点

(三) 温州方言的发展及其特点

(四) 温州方言的分布

(五)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及其特点

(六) 温州方言的发展及其特点

(七) 南宋时期温州话已具有其他吴语区的特点

(八) 温州方言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第二节 温州方言文献及调查记录

(一) 字书韵书及笔记

(二) 方言韵书、韵图

(三) 民间歌谣及谚语

(四) 现代的温州方言记录

第三节 近百年温州话有的演变及语音系统

(一) 声母系统的变化

(二) 韵母系统的变化

(三) 青年一代的声母发展

(四) 声调变化

(五) 声母系统音变

第四节 本书所用符号

温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市方言志

温州方言志目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本市概况

——地理、人口、沿革、经济、文化、地位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一) 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二) 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三) 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四) 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五) 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第三节 温州方言文献及调查记录

(一) 字书韵书及笔记

(二) 方言谣谚、谜语

(三) 民间杂字及词曲

(四) 现代的温州方言记录

第四节 近百年温州语音的演变及新老派差异

(一) 声母系统的变化

(二) 韵母系统的变化

(三) 青年一代的声韵发展

(四) 声调变化

(五) 常用虚词音变

第五节 本书所用音标符号

温州市方言志

(三) 声调 温州方言志目录

(四) 声母其他常用符号

(五) 记述 第一章 总论 音字母对照表

第一节 本市概况

——地理、人口、沿革、经济、文化、地位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一) 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二) 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三) 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四) 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五) 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第三节 温州方言文献及调查记录

(一) 字书韵书及笔记

(二) 方言谣谚、谜语

(三) 民间杂字及词曲

(四) 现代的温州方言记录

第四节 近百年温州语音的演变及新老派差异

(一) 声母系统的变化

(二) 韵母系统的变化

(三) 青年一代的声韵发展

(四) 声调变化

(五) 常用虚词音变

第五节 本书所用音标符号

(二) 元音

(三) 声调符号

(四) 本书其他常用符号

(五) 记北京音所用音标与拼音字母对照表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本 市 概 况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是浙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省最大港口城市之一，全国14个开放城市之一。市境介于北纬 $27^{\circ}03' - 28^{\circ}36'$ ，东经 $119^{\circ}37' - 121^{\circ}18'$ 。全市东面濒海，南与福建省交界，西面是丽水地区，北面为台州地区。辖瓯海、永嘉、乐清、洞头、平阳、苍南、泰顺、文成八县（1988年前还辖瑞安市，瑞安亦说温州方言，下面所述仍包括瑞安）。市区分鹿城、龙湾区二区；龙湾为开发区，鹿城为旧城区，今为市府驻地，瓯海县府亦驻此。全市面积11751平方公里（包括瑞安1360平方公里），1982年全国人口统计为592.8万人（内瑞安99.3万人），截止1991年为 人（内瑞安 人），其中市区160平方公里，1982年为50.8万人，1991年为 万人。鹿城区99平方公里，1982年为 万人，1991年为 万人。

温州是1949年建国时析原永嘉县城及瓯江南岸县境建市的，包括今瓯海县在内，当时人口是44万人（城区16万），1982年统计时瓯海已自有48万人。而据记载清光绪五年（1879）永嘉全县（包括今市区、瓯海、永嘉）为95万人，至民国二十年（1931）却减至68万人（内城区14万），全温州地区也只255万人（包括玉环13万）。1942年调查永嘉全县也只75万人（内城区13.6万，今龙湾瓯海各区合计24万），可见建国四十余年来人民安乐，经济发展，全区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城区增三倍以上，与建国前形成明显对比。

这里秦汉以前为瓯越地，秦置于闽中郡辖下。汉惠帝立东海国（东瓯国），武时内迁江淮。东汉为章安县东瓯乡，属会稽东部都尉辖下。永和三年（133年）以东瓯乡置永宁县，仍属会稽郡。吴属临海郡，东晋太宁元年（323年）分置永

嘉，为温州建郡之始，并始建郡城（“斗城”“白鹿城”）。辖五县，包括今丽水地区。隋大业间一度与临海郡并置于处州（括州）辖下。唐武德间一度分置永嘉州，贞观间又属括州。上元二年（675年）始置温州，因地在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故取名温州。从此温、括（处）各自为州。南宋咸淳间升为瑞安府。元至元间改温州路，明清都称温州府。1912废府时曾置瓯海道。1949温州置市后，永嘉县府（一度称双溪县）先后迁瓯江以北岩头、枫林、塘头，后定迁上塘镇。1981又分置温州市郊为瓯海县。

本市西部为丘陵山地，东部为濒海平原，物产丰富。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富鱼盐航运之利，渔业词汇丰富。又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东南部可生长荔枝龙眼橄榄榕树等热带林木，年平均气温 $16.1-18.2^{\circ}\text{C}$ ，无霜期 $260-280$ 日，作物一年三熟。夏秋间多台风，风力八至十二级，易造成灾害，历史上曾由此引起南宋时长溪迁温州大移民。

温州为历史悠久的名城，是南戏的发源地。唐宋以来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尤以草席、工艺美术品制作著名。清光绪二年（1879）据中英《烟台条约》开为商埠。但至1949年建市时连汽车还没有。建国以来才迅速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多门类的工业城市。温州拥有商业经营传统及众多华侨。

温州有雁荡山、仙岩等名山奇景，还有江心孤屿，积谷山麓春草池等名胜古迹，为历代诗人名士所咏赞。谢灵运为温州名太守，其山水诗名作也多咏温州胜景。人杰地灵，永嘉学派，四灵诗派，永嘉戏文等都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篇章。

温州是著名侨乡，在国外的温商侨民有二三十万人。而且多在经济较发展的西欧国家。温州成为经济发展的开放城市，不但国内，国际友人及华侨子弟也更盼望更多的了解温州。而在此时，独特的温州方言更会引起人们的关心。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一）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温州方言是一支重要的吴语方言，向被看成吴语的南极，是南部吴语的代表，为国内外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一致所重视。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汉语方言字汇》（见所著《中日分析字典》及《中国音韵学研究》所附）吴语只

收上海和温州；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浙南只收黄岩和温州；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全国主要方言区方音对照表》，北京大学《汉语方言字汇》《汉语方言词汇》吴语都只收苏州和温州。即此可见国内外语言学家都认为温州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具有重要地位。国外学者研究汉语方言尤其吴方言的文章大多引用温州话，并且出了研究温州话的重要论文和专著，如国际著名汉藏学家张琨也写了《温州方言的音韵历史》，详第三节（四）。

温州方言保留古音韵特点多，古词古语法现象多，具有许多其他吴语所无的变异现象，因此温州方言研究对汉语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温州为南戏发源地，温州话对戏曲语言很有影响，温州方言研究对南戏作品研究也很重要。

（二）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本方言分布在浙江东南角，是吴语的最南部分，在国内以至省内，都是有名难懂的方言。其基本通话范围只有温州市区及市属各县：瓯海、永嘉、乐清清江以南，瑞安市、文成，洞头一半，平阳大部，苍南小部分，泰顺百丈，加上丽水地区青田县的温溪区及万山区一部（皆旧属永嘉划归青田的）及台州地区的玉环一角（陈岙李岙）。但由于温州在浙南的重要地位，浙南其他地方会说温州话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平阳、苍南闽语区中也有温州话方言岛，如平阳水头，苍南蒲门。浙闽省境上的蒲门城及其附近几个小村说一种别有特色的温州话，应算是吴语最南的分布点了。

以苏州、上海、嘉兴为代表的北部吴语区的人跟浙东宁、绍、台州人尚能通通话，而苏沪、宁绍、台州人跟温州人都无法直接通话。因此说北部吴语的人们就曾认为温州话不是吴语而是闽语。早先著名学者余杭章炳麟（太炎）在《检论·方言篇》给汉语方言分区时就提出“浙江温处台附属福建而从福宁”。不但温州话处州话，他连比较接近北吴语的台州话也都看成闽语了。章氏“闽语说”曾为民初以后的地理教科书采用，因此影响很大几被视为定论。但这种分法并不科学，1915年至1928年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本）、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相继出版，温州话音言得到科学的记录，吴语说开始得到语言学界的承认。抗战时王力在《中国语文概论》（开明版，解放后改名《汉语讲话》）提出汉语方言五分法时，就采用吴语说而列为吴语温台系。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拟订《语言区域图》时，已将温州话正式列入吴语。

根据温州话的语音系统与方言词汇语法的基本特点（如保持古塞类声母三级分法、全浊母读浊，“山咸”诸摄字鼻尾消失，“日”母文读同“船禅”，“微”母文读同“奉”母，“不”读f母，“儿”尾读ɿ等）温州话属于吴语而不属于闽语是没有疑问的，虽然语词、语法成分上有一些闽语的影响，但由于闽温间语音差距相当大，这些影响并不很引人注目。这从纯温州人听不懂任何闽语而能部分地听懂绍兴话、宁波话、上海话，也可以证明。新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1987年出版）将吴语分为六片，温州话列为吴语瓯江片。

但直到解放以后，闽语说仍还有人主张。这除了个别人是因袭旧说外，其余可能因以下事实引起误会，因温州南部县分和东部岛屿确有说闽语的居民，也易误将这些分布在浙南飞地上的闽语当作温州本地话了。事实上泰顺、苍南本都有土著的闽东话（俗称“蛮讲”“蛮话”，泰顺县城及西北部则说处州吴语系统的“罗阳话”），正可说属于“福宁”系统的。明清易代之际，清初对台的禁海政策，促使大批漳泉移民迁至苍南（当时为平阳南部）、平阳、泰顺，以后为渔业需要，又有那里的移民迁至洞头及其他县沿海滩涂渔村，他们带来了闽南话，今已发展至近百万人，在苍南成为主要方言，在温州南部县分也有巨大影响。虽然这样，它在当地仍被称为“福建话”，与温州话明显不同，当地是分得很清楚的。不但“福建话”“蛮话”与温州话不能通话。同是吴语系统的“罗阳话”，乐清清江以北的“太平话”（太平为温岭旧称，属台州吴语），苍南金乡的“金乡话”（为明初“金乡卫”驻军传留的话，属北吴语夹杂官话成分）也都不能跟温州话通话，更不用说畲族人说的“畲客话”了，（那是接近客家话的）。

以下所讨论的方言源流都只指温州本地话而言，不包括温州各县分布的其他方言。并且是以它是吴语的角度探其源流。

（三）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推断温州方言形成的上限比较难，联系当地历史则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汉武以前这里住的还不是汉人，自然不会有汉语方言。当时温州地区及台州处州地区住的主要是瓯越人。他们曾建立以东瓯为王都的东海王国或东瓯王国。瓯越王臣属于汉并受汉册封，但汉朝尚未在这些地区直接行使权力。

瓯越族“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不冠不履而“跣行”，以“海蛤”“蟬蛇”为食，生活风习跟汉族大异。据《史记·东越传》，瓯越、闽越都是古於越族的一支。从现存古越语记录（如《越绝书》“越人谓船为须虑”、盐官称“朱馀”）古吴越地名的越义（如山称“夫”——夫椒、地称“馀”——余杭、馀暨，善道称“缓伊”或“盱胎”）等观察，古越语属于侗台语系统，其非汉语是可以确定的。从《说苑·善说》所载的《越人拥楫歌》无法听懂需要翻译的故事，也透露古越语和汉语差异很大，不属一种语言。

汉代扬雄《方言》也记录过四五条东瓯词汇，明写“东瓯、瓯越”的是三条，其它两条称“越之垂、瓯吴之外鄙”“荆吴扬瓯之郊”。对这些古瓯语的性质因材料太少颇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温州人没有一条能懂，如“广大”说“参纓”或“羞绎纷毋”，“作为”说“印”等，不仅温州，邻近其他方言以及古文献也都罕闻有用例，跟“吴、扬越”一些词汇还可在古汉语文献中找到用例者也不相同。因此瓯越语跟汉语差异必定不小。

那么，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王驹望率其部众内迁江淮间，和元封元年（前110年）东越国被灭同样内迁之前，这里不可能形成汉语方言。而其后一段时间内也未形成。下面结合东瓯史实论证，说一说理由。

汉武以后这里实际上还长期未曾汉化。因为：（1）汉武帝采取“虚其地”的政策，未相应移汉民实其地；（2）当时越民并未尽迁，迁徙后遗民力量仍很强大。虽然《史记》说“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用了“举国”、“悉举众”字样，这只是据武帝“诏军民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立论。诏令实际未能彻底执行，有五个证据：

（1）据《年表》“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内迁人数只有四万余人。如说这就是瓯越全部人口，是不可信的。因为据《吴王濞传》东瓯遣往丹徒从吴王濞作战兵力就“可万余人”。依此推算，东瓯全国兵力及全国人口应大大超过四万人才合。再说《汉书·严助传》记汉武遣兵闽越时，淮南王刘安上书云：“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仍足”。以闽越这样大的军力，东瓯如果真的全国只有四万人，怎能与它抗衡，久久相持不下，而得远求汉援？这四万余人说是东瓯王国的君臣、军队及王畿居民，庶几近之。

（2）《太平御览》卷171引《吴地记》：“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东瓯内徙后，故地被闽越余善的

东越王国兼并，“东越”统治中心在建安，后来情况也跟东瓯相似。《宋书·州郡志》：“建安太守：本闽越，秦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者。……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另外那个闽越王国的境遇也差不多。《旧唐书·地理志》：“福州：闽，汉冶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属会稽郡”。这些记载说明东瓯、东越、闽越三王国被内迁后，故地都仍有遁逃遗民，后来分别立为回浦、冶、东冶三县，置东部、南部、侯官三都尉（参：《元和郡县志》：“东越王都东瓯，今温州永嘉县是也，后以瓯地为回浦县”。《嘉泰会稽志》18：“闽越为冶，东瓯为回浦”）。

（3）正由于还有遗民不服，特设“都尉”镇抚。都尉侯官是汉代为镇抚少数民族、防备边患而特设在民族地区的。当时会稽东部都尉侯官跟西北玉门的都尉侯官齐名，极受重视。《太平御览》卷241引《临海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于侯官，以镇抚二越，所谓东南一尉者也”。又卷171引《汉志》：“回浦，东部都尉理，属会稽郡，杨雄《解嘲》曰：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在东越闽越王国主干力量被迁往江淮后，这里还要特设都尉侯官，可见越族遗民力量之强大。

这些遗民遁入山谷后，跟其他地方的山地越人一样，被称为“山越”。东部都尉治在其压力下曾被迫步步北移，在西汉末已北移到宁波一带。《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据清一统志卷224、卷230：章安故城在今台州府东一百十五里章安市；句章故城今宁波府慈溪县西南；鄞故城今奉化县东）。

正因为只设会稽东部都尉还不足以镇抚越遗民，故以后又在冶（建安）设会稽南部都尉，在东冶（福州）设侯官，（上引《临海记》说元鼎五年所建的都尉府设在侯官，有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4即指出：案《宋书·州郡志》，‘侯官，前汉无，后汉曰东侯官，属会稽’，【《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之】东部侯国当即东侯官之讹。《郑巨君传》注引《太康地志》云‘汉武名东冶，后改为东侯官’。按所以叫“东侯官”或“东部侯官”，是指会稽东部之侯官，相对于西北张掖、龟兹的侯官城而言）。也就是说东汉在东瓯、东越、闽越三王故都，全部建

立了军事据点。

(4) 东汉王朝能增设军事据点，还靠作出大规模军事行动。《太平御览》卷238引《东观汉记》：“张意拜驃骑将军讨东瓯，备水战之具，一战大破，所向无前”。驃骑将军属汉王朝高层将领，要拜这样高的将领大事讨伐东瓯，可见至东汉时东瓯越民的力量相当强大，控制越地极其不易。虽然经过这样的军事努力，终东汉之世，所取得的成绩仅在东瓯故地分设两县，即将回浦县（一度并入鄞县为回浦乡）分为管今台州地区的“章安”（《后汉书·地理志》云“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但注引晋元〔太〕康志说：“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及管今温州、丽水地区的“永宁”（顺帝“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开始将台州与温州处州分为不同的县。在今福建地只汉末在建安分设汉兴县（孙吴改名“吴兴”，今浦城），在东冶设侯官县。直至三国时，会稽与永宁、东冶的来往还靠“浮海”，内陆还难以控制（参《三国志·吴志》虞翻传、孙策传，王朗浮海奔东冶（东部侯官）求援于侯官长高升事。从孙策、诸葛恪、陆逊诸人传中都能见到当时会稽以南山越杂布，吴人如何艰苦开辟的事实）。

三国时，人还不认为这些地区已是汉土。《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

“章安、永宁、汉兴”这些县的取名也正表明了章和时、永和时、汉末时汉朝廷对这些地区安宁的关心。

(5) 吴沈莹曾记述了当时临海郡山区越民遗裔的情况。《太平御览》卷780引他的《临海水土志》：“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牖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吴安阳县包括今瑞安、文成、平阳、苍南、泰顺等县（初名罗阳，孙皓改安阳，晋武帝改安固。罗江县在其南部，为今福鼎等县，晋武帝在侯官建晋安郡时才将它从临海郡划归晋安郡，见《宋书州郡志》）。点明吴时永宁之南广大地区的居民都还是越人子孙。

以上史实说明，东汉时章安、永宁、建安、侯官四点的守军当是首批进入两越的汉人，他们为以后在这些地区形成汉语方言打下初基，但当然不能说在那么一支永宁守军中就已产生出温州方言，至少它与章安还有一个长长的分化过程。

方言的分化与历史行政区划有一定联系，温州话今限于温州府所辖各县即是明证（浙江各县方言大多也依旧府属划分）。方言的亲疏远近也跟区划分置先后关系

有联系。温州地区在开发之初的汉代是属会稽郡的，最早来开发的军民主要应来自会稽郡、吴郡，所以它成为吴语一支是源流有自的。吴孙亮太平二年分置临海郡，台温处地区先与北部会稽郡分家。至东晋明帝元年分置永嘉郡，温处地区乃开始与台州分开；隋一度合为处州（括州），唐武德五年从括州分置东嘉州（高宗上元元年定名温州），处州跟温州也分开了，这是温州独立发展的基础。现在温州话、台州话、处州话都有相近之处，但比较起来，处州话比台州话要更接近一些，这是与行政区划分置先后关系相一致的（福建先分建安、晋安二郡，今大分为闽北、闽东、闽南三大方言，而厦门、福州同在晋安郡，故今闽南话、闽东话的关系，比闽北话更接近，可以类比）。

浙南人口的发展与东吴和东晋的开发有关，它们建国江左，自以开发江东作为重点，故汉代瓯越地区的章安、永宁两县，据《宋书·州郡志》，至晋时已发展为临海、永嘉两郡，所辖十县，四个是吴新置的，三个是晋新置的。（相应的在闽越地区，建安、侯官两县也发展为建安、晋安两郡，所辖十二县，除旧县外也都是东吴至晋新置的）增设县份表明在上述地区汉人力量大为增强，其中包括人口自然增殖，汉人移民增加及当地越民接受汉化等不同方面。这从侧面反映从吴代开始，温州在吴方言范围内开始发展。但吴晋时温州人的话应当还是当时江东方言的一部分，未及独立分化。温州城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初，传说是郭璞设计的。郭璞熟悉江东方言，在他的《方言》注，《尔雅》注中屡引当时“江东”“江南”方言，其中与今温州相合的还有十余条（如“膳”〔 〕一，〔缸〕，甌，槽，场，狙〔粗〕，敦〔墩〕，浦，〔滩〕，漂，虾蟆衣”）说明温州话与晋时江东方言有源流关系。但当时永嘉郡才初与临海郡（台州）分开，处州地区尚未开发，仅为松阳一县，温州话还未跟台州话充分分化，与处州话更未有分化条件，离形成独立方言还有很远距离。

温州与处州分置始于唐代，唐代社会安定，这为封建社会封闭经济下封闭式方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推测温州话是唐时独立发展为自有特色的一支吴语方言的。因为下面将证明宋时是温州话已经确定形成别于台州处州话的下限，而唐时闽语吴语都已形成为有重大区别的方言，所以我们这一推测是有事实根据的。

（三）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温州方言至迟到南宋已早已形成了，并与台州、处州方言明显相分别，这有两方面的证据：方言记录及移民同化。

方言记录上的直接证据有《六书故》与《张协状元》《四灵诗集》。

(1) 宋末永嘉人戴侗(1200——1285)的名著《六书故》已经明确指出温州与台州、处州(括州)的语音差别。如“人”，瓯人作“奴登切”(呼若“能”)，而台人作“鱼邻切”。“作那”的“那”瓯人“奴谐切”，而台人合“作那”二字为“则皆切”，括人“奴弟切”。

《六书故》还记录了好些温州俗语词，如喉咙称“喉”，(河豚)称“乌狼”，鲷鱼称“鲷鰓”，荐(臭虫)称“茭虱”，蜃(蚯蚓)称“康蛭”等，这些至今仍都是温州话的特殊方言词。这本书还收了不少温州俗字俗解，如“鱖”作小石首鱼名(今称“朱鲃”，“白肚鱼”)，“𩚑”作为小干鱼名(今或作“𩚑”或写“叩”)，“𩚑”念“乌介切”解为小蟹名(今称“𩚑儿”)，“𩚑”作为治的俗字，“𩚑”解为“篮类”等。还有俗音，例如“尿”音息遗切，“母”音莫古切，莫下切，“阿”音於黠切，“𩚑”音康根切，“甘”呼若“念”等。“寿”读“人久切，又去声”，更是吴音“日禅”两母相混的明证。

由于一种方言发展到能够影响书面形式的阶段，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准备过程。那末，在《六书故》记载俗字俗音之前应经过一段历史时期，温州话的形成当然要远远早于南宋。

(2) 现存最早的南戏《张协状元》一般都认为是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的作品，其中所用地名如“徽州婺源县祠山广德军，浙东路处州，西川成都府，梓州”等确实都是宋代的。这个戏丑角净角副末的说白中已使用了不少跟现代温州话特点相同的语句，例如“老鼠拖个馱猫儿”，“二十四个月日没一人上门”，“你也忒炒”，“学你只会吃死饭”，“亚哥，有好膏药买一个归”等等，都已跟今天说法差不多了。

(3) 《四灵诗集》赵师秀《缙云夜宿》：“稍觉离家远，乡音一半讹”。可见当时温处方言已经不同。

移民受温州话同化的证据：

温州在南宋时曾接受中原和闽东北的两次大移民，但这些移民并没有对温州方言造成明显的影响，说明当时的温州方言已相当稳固，有力量同化移民。

从大范围看，当时吴语也已是一支很稳固方言。宋室南渡后，大批以旧部汴洛人为中心的北方移民集中在杭州，移民的中州话跟杭州吴语曾发生融合，使杭州话带上明显的北方话色彩，发展为以吴语为骨干，而掺杂北方话代词助词系统的一种

特殊吴语方言。拿今杭州话跟周围吴语比较，杭州的“他们、的”等说法，“不、是”等读法，显然是从中州来的。这个融合的活标本充分说明了：

(1) 宋代的北方话和吴语都已带有今天北方话、吴语的特点，是区别明显的不同方言。例如北方“儿”尾读[ɿ]，不同于吴语[n]，杭州话“儿”尾读[ɿ]是融合北方音的结果。(2) 这种融合局限于杭州一城，表现为语言岛式，在其郊县余杭（如今塘栖镇）儿尾即仍读[n]而不读[ɿ]，更不用说其他广大吴语地区了。这表明当时吴语方言已很稳固，除了在北方移民占优势的国都临安，一般吴语地区都未受到大的冲击影响。

根据温州族谱墓志史料看来，由于高宗南奔时曾驻温州，太庙留温时间更长，当时“从驾”来温尔后定居的北方大族也不在少数——包括了宗室皇亲，较著的如赵氏、高氏、冯氏、徐氏、陈氏等。但在温州并没有引起像杭州那样的明显变化（检查温州话中的北音成分只有些零星字例，如“松”文读sɒn，“傢一伙架一子”读tɕa，“规矩”读kai tɕy，“亏愧”文读k'ai等，从其来源看，语音已经清化，可能传入时代要晚些，包括交际、教学、戏剧多种影响）。

稍后又有闽语移民。唐宋时的闽语，也已是一支具有跟现代闽语相同特点的方言。唐诗人顾况在《团》诗中所指出的闽人呼父为“郎罢”，呼儿为“团”，《集韵》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团”，旨韵之烱切“闽人谓水曰林”，至今都仍为闽语重要特征。宋孙奕《履斋示儿编》数引闽中口音，也大抵与今相同。如卷23引《古今诗话》：“章圣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乙弥高（读作歌）。会考试者亦闽人，遂中选”。歌豪同韵，也跟今语相同。唐末及宋南渡入闽大族为数不少，同样对闽语没有出现大冲击，可见唐宋闽语同样已很稳固。

而值得注意的是，族谱墓志史料表明温州地区现代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其祖先是来自福建的，尤其是闽东北长溪（今霞浦）赤岸一带迁来者最多。1964年郑张尚芳曾收集到35族，今福鼎周瑞光同志又搜集到57族，现选录族谱坟志实例十种为例：

〔A〕瓯海水场（今作永强）：英桥王氏族谱（明万历五年王叔果修），先世五代后唐时由闽赤岸徙沙城英桥。

〔B〕寺后郑氏宗谱（光绪二十年重修），唐末从赤岸迁乐清，兄弟四人分居括苍、瑞安、乐清、临海，明代从乐清象山再迁永场。

〔C〕黄石张氏宗谱（光绪癸酉重修），赤岸迁玉环，元至正间再迁永场。

〔D〕沙川周氏宗谱（同治癸酉重修），宋淳熙间奉令迁瓯城谢池里，绍熙间再迁乐清柳市，元延佑间徙居永场沙村。

〔E〕永加：合溪菴田明文戴氏宗谱（乾隆乙卯年重修），唐末避乱从闽迁仙居黄婆滩再迁合溪。

〔F〕瑞安：鲍川戴氏西祠宗谱（民国27年重修），自闽赤岸迁居鲍川，历宋迄民国九百余年。

〔G〕盘谷孙氏族谱（温州府江东方言关系），系出长溪，五季时徙居盘谷。

〔H〕乐清：翁垵陈氏宗谱（加庆甲子年重修），始祖之祖后同时从赤岸迁江西弋阳，宋嘉定时再迁乐城雁塔里。

〔I〕平阳：瀛桥项氏宗谱（光绪己卯重修），五代避闽王曦僭乱，从赤岸迁金丹乡瀛桥里。

〔J〕元教授王忠道圻志：先世晋天福间由闽长溪徙温之平阳並仁乡岵山。

温州好些名人大家也源自闽迁。如宋薛季宣，先世自长溪廉村迁永加（见行状）；陈傅良，先世自长溪劝儒乡温秀里徙瑞安帆游乡岵义里（止斋集50族叔祖元继圻志）；周端朝（浮沚）其先自赤岸徙居永加松台；明内阁首辅张孚敬，其先从闽赤岸徙永加永强华盖乡普门里（永加县志32引张氏谱）。迁徙时常集体行动，聚族而居。如《瑞安县志·族门》李氏“陶山镇垵头一百十二户由闽赤岸来”。但这些移民并没有保留闽语，后来都改说了温州话。

据史料，闽人大批迁徙来温州有两次：一次在唐宋五代战乱期间，主要即上引〔I〕瀛桥项氏谱说的避闽王曦之乱；一次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八月十六日温州地区台风洪水为灾之后。〔D〕沙川周氏谱云：“乾道间吾瓯遭洪水患，所余黎民靡有孑遗，奉口徙福民实其郡”。因沿海各地人口损失各以数万计，所以命令福民来迁，于是出现大批“长溪实温”的移民。

这两次闽人大量入温，对温州话也没有发生像杭州话那样明显的影响（只在词汇上有零星影响）。因此可以推想，不但南宋时温州方言已很稳固，并且五代时就相当稳固了。《六书故》作者戴侗的祖先就是唐末从赤岸来的（见上引〔E〕合溪菴田戴氏谱），但从《六书故》所举俗语特点看来，戴侗的语言已完全是温州话而不是闽语，这证明唐宋时温州话已形成强大力量足以同化迁入的闽语移民（至于蛮话是先唐土著方言或唐宋闽语移民因聚居而保留，还要待进一步搜集材料论证）。

既然南宋时温处台三州方言已经明显分化，当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参考唐宋移民被同化的事实，我们认为温州方言唐五代已经形成，唐时不必说，五代时在吴语区建立的吴越国也比较安定繁荣，这对吴语各方言的发展与巩固可能起过一定作用。

(五) 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上面说过，温州方言跟晋时江东方言关系密切，这也很自然，因为当时的吴语正是江东的代表方言。虽然缺乏当时吴语的完整记录，但隋陆法言编《切韵》曾经参照过吴音，故至唐时即有人目之为吴韵的。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今日温州话的声韵调系统都跟《切韵》《广韵》系统相当接近。

声母方面温州话清浊分明，古全浊声母今都仍读浊音，泥母与来母，疑母与零声母绝不相混，这虽然是其他吴语也有的特点，但像温州读得这样分明与切韵一一对应的也是不多。特别是章组声母切韵原属三等 $t\epsilon$ 组，北部吴语大都读 ts 组洪音了，温州除“假遇止言梗深”及“臻开”六摄半变 ts 外，其他都仍保留读 $t\epsilon$ 组，同切韵读法。

有一批字，好些方言声母读法与《广韵》不合，温州的读法则完全符合《广韵》反切，如：“不 $\equiv fu$ 宫 $\equiv sei$ 、峻 $\epsilon o \eta$ 、屿 zei 、松 $\equiv jy$ ”

韵母方面温州更有特色，《切韵》的一些韵类，别的汉语方言以至别的吴语方言已不能分的，温州话却仍然能分。重要者有六（下面皆举平声韵目以赅上去）：

(1) 通摄能分东冬与鍾，如：中 $te o \eta$ $\neq$ 钟 $te y \cup$ ，宗 $ts o \eta$ $\neq$ 纵 $te y \cup$ ，虫 $de o \eta$ $\neq$ 重 $de y \cup$ ，农 $no \eta$ $\neq$ 浓 $ny \cup$

(2) 效摄能分豪肴及部分萧宵：保 pa $\neq$ 饱 $pu \cup$ ，高 ka $\neq$ 交 $ku \cup$ ，小 ie $\neq$ 晓 ca ，绕 nie $\neq$ 鸟 na ，绕 nie $\neq$ 尿 na （乐清虹桥还能分清 siu $\neq$ 箫 $su a$ ）因此依温州竹说 $[mu \cup \quad te \cup \cup]$ 而非 $[m\epsilon \quad te \cup \cup]$ ，可见说的符合古语“猫竹”“茅竹”，而非毛竹。

(3) 止摄舌齿字能分之脂与支：止 $ts \uparrow$ $\neq$ 纸 $ts ei$ ，持 $dz \uparrow$ $\neq$ 池 $dz ei$ ，时 $z \uparrow$ $\neq$ 匙 zei 。因此温州胭脂说 $i \quad ts ei$ （不是 $i \quad ts \uparrow$ ），表明仍说的是古语“燕支”而非后世的“胭脂”。（温州支读 ei 是读如齐韵，永加对有些齐韵的字读 ai ，不同于支，如鸡 $tes i$ ，泥 nai ）。

(4) 遇摄口语能分鱼虞：鱼 $y \oslash y$ $\neq$ 愚 ny ，锯 $k \oslash y$ $\neq$ 句 $j y$ ，去 $k' e$

l = 驱 tcy, 渠 tsei = 瞿 dzy, 猪 tsei = 株 tsl, 竺 dzei
= 柱 dzl, 簪 dzei = 住 dzl, 煮 tsei = 主 tsl, 储 tsei = 殊
zl, 蚱 tsei = 聚 zl, 杵 tsei = 狙 tsl。

(5) 咸摄三四等舌齿字东郊永强有别，三等是*t*，四等是*iε*，*ja*，如占是*tεi*，店是*t iε*，粘是？*ni*，鯨念口语作*na*，从而咸山四等也有别：天*t' i*≠添*t iε*，田*di*≠甜*d iε*，颠*ti*≠蹠*t iε*。

(6) 通摄及宕摄合口一三等见组字有别：公工 k o ŋ ≠ 弓宫 t c o ŋ 恭供 t c y o, 孔 k' o ŋ ≠ 恐 t c' y o; 汪 u o ≠ 王 j y o, 谎 h u o ≠ 况 c' y o, 旷 k' u o, 光 g u o ≠ 眶 t c' y o, 狂 d z y o。

在声调方面温州为四声八调系统，平上去入各依声母清浊分阴阳，如“丹田旦搭，谈谈蛋达”。字的平上去入归类也基本上同切韵，古浊母上声都读阳上，没有其他方言中很普遍的全浊上声归去的现象，如“动” $d \quad o \quad 9 \quad 33 \neq$ 洞 $d \quad o \quad 9 \quad 22 \neq$ 冻 $t \quad o \quad 9 \quad 42$ 。温州声调的调形，阴上阳上相似都读升调，阴入阳入相似都读降升调，阴阳调形相同，只是高低略有区别，照音位观点看，因阴阳调所结合的声母清浊不同，甚至还可以认为温州上入都只有一调，阴阳还未真正分化。

温州阴调字中，平声读平调 4 4，上声读升调 3 5，去声读降调 4 2，入声读曲调 3 2 3（连调则读短调）。调形基本上同“平、上、去、入”的字义相当。这表明温州声调系统跟切韵的确相近。

温州各县声调差别不大，这很重要。因各县声韵差别不小（如温州“太阳” t' a j i，乐清作 t' o j a），而声调读法及连调调型相同，所以通话不难，只文成话（包括泰顺百丈话）声调尤其变调系统差异较大些，通话就显得不便。

以上说明了温州方言与切韵系统的密切关系，但温州方言并不单纯，它在历史发展中保留了多个历史语音层次的沉积，新的变异层次也很丰富，因而声韵的变化较多。

例如日母温州文读多作 z、j：“日” zai “然” ji，是较新的层次，白读作 n、n，如“日” nai，“日——、——” ne，“然——讲” ni，是较古的层次。但口语又有 dz 的读法，如“绕”文读 jie，白读 uie，——，nie——，dz ie——，——，“若”文读 ja，白读 na——，——，又有 dza，——，日母读 dza 则是同于闽南话的变异。微母字白读 m 知母 m，望 mu——，——，最古，文读 v，如蚊 vaŋ，较新，而文读 hu——

如蟹，最新，因老派还读 $v\omega$ 。

歌韵字切韵时代只读 a ， ua ，三等为 ia ， iwa ，而今温州竟有十多种读法。三等还只 l 、 a （茄— dzl ，茄— ga ）， y （靴— cy ），而一等竟有 a （歌） o （坐） u （罗） ϕ （魔） η （我） $o\eta$ （糯） $u\omega$ （可） a （那阿） ai （个饿） e （呵） i （左— z ） i （个这）等十二种，实足令人惊异。其中 a （破拖之白读）为中古隋唐音层次， ai （包括 e 、 ei 、 i ）是上古音层次， o 是近古层次， u 是近代层次，其他都是 o 和 u 的最新变异。而歌韵读 ai （温州有“簸柄裸个饿饿委坐琐”等字）在龙泉、庆元、福州、福安、古汉越语、朝鲜借词中都有相同的反映，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现象，为北吴语所罕见。

乐清什么说 $ga-m$ 是“何物”的古音，温州说 $ha ni$ （旧为 $ga ni$ ）是“何物样”的台音，口语常用词还能保持“何”读 a 的层次，跟“阿—那—”一样。

温州话元明以来类属吴语是很清楚的，明姜淮《岐海琐谈》所记方音白读“来音离……大音徒去声，松音从，日音逆”等基本上同其他吴语，《水浒传》（施、罗皆久寓武林）、三《言》两《拍》、《山歌》、《挂枝儿》《笑府》、及昆曲说白中所记方语方音也大量与温州相同。一些很特别的如〔明〕陆容《菽园杂记》“吴人呼‘又’为‘以’音”（《山歌》作“噢”），温州也是 ji 。明方以智《通雅》：“今吴中呼水为‘矢’，建昌人呼水为‘暑’”，亦与温州相同。

唐宋及其前的材料也与此不殊。《广韵》荡韵匹朗切：“髀，髀吴人曰‘旁’”温州说：“脚髀硬起”，猪大腿叫“髀蹄”。《集韵》御韵陟虑切“”，吴俗谓盛物于器曰“”，温州现说 $tsei$ ，（是“著”的别体，实即“著”字引伸），《韵》王遇切“霄，吴人谓虹曰霄”，温州现说 $ha u$ ，此是三等读如一等，现吴语霄然（俗写作“蜚”），这跟闽语读“雨”为 $h\omega$ ，安徽旌德“芋头”变“候” xi 头”都是同型变化。《集韵》寒韵虚干切“鼾，卧息也，吴人谓鼻声为鼾”，此字〔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晋〕葛洪《要用字苑》亦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说明早就是江南方言，今温州说 $cy < cy y < h\phi$ 。

《宋书·乐志》“吴音呼绪为”（“绪”邪母字本音序，澄母字），今温州读 dzl 序 $z l$ ，而与 同声母，也是古吴音所留特点。最有意思的是〔唐〕《朝野僉载》卷二记冀州参军鞠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以“行、哀”为韵，司功怪而问之，答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行”字“哀”字同韵，那竟与温州